



# 读圣贤书，所为何事？

——像文天祥那样读书

□ 叶海波

有朋自远方来，想到附近的景点看看，我都会首选吉安县城的文天祥纪念馆。30多年里陪朋友去过许多次，看完纪念馆若还有兴趣，我会再带着他们去文天祥读书的地方——白鹭洲书院看看。如果还有时间，也是要去文天祥陵拜谒的。文天祥的生平经历、求学书院、魂归之处就这样一次性走完了，一馆一院一陵就这么串成了一条线，成了我接待远方来客的保留节目。而我也在一次次陪陪中不断清晰、丰富着对文天祥的认知。

每次在文天祥纪念馆里看他20岁中状元后那27年的经历，总是会感叹，叹那种破碎山河中个人的漂泊无依。我也曾问自己，如果自己生在那个年代的读书人，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

面对元军的铁骑，不少读书人选择了投降，这里面有文天祥的同僚、上司，还有人选择了沉默、避隐山林。可文天祥告诉世人还可以这样，至死怀着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的气概和决心，坚持着读书人的气节、担当和责任，用一副铮铮铁骨，成就了一座精神的丰碑，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里。

蒙古铁骑灭掉西夏用了22年，灭掉曾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23年，而对南宋的战争前后跨越45年，成为耗时最长的战争，还搭上了一个巨大的性命（宋军曾于1259年杀蒙哥汗于钓鱼城）。在蒙古贵族们的心中，肯定很疑惑：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柔弱的南宋？他们为何如此坚强？

起初，忽必烈想通过降服文天祥来证明，这些南宋人坚持的道义是可以打破的，但是文天祥的选择让他有了深深的挫败感。文天祥之后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一个高度已经确立，谁也不能怀疑那些华夏文明中的圣贤之道，是完全可以在一个读书人身上得到印证的，他成了儒家“取义成仁”的典范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所能拥有的完美人格。

今天的我们在感动文天祥的坚持，感慨他伟大的同时，是不是也会浮现另一个疑问：那就是他接受的教育，或者说在他成为一个读书人的过程中，是如何建立并完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自我严格要求，又是如何在内心构筑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信念呢？

答案很简单，不外乎“读书”二字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，“读书”二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获取行为，而是一种关乎人生根基的精神实践。自先秦以来，历代学者无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，将其视为“立学之本”“为人之始”。文天祥是这些读书观的践行者，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知行合一的典范。

文天祥的大义，当然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，而他在遗书中所提到的读书，却贯穿他的日常。日常与非日常、所思与所为，经由读书串联起来，也拷问着每一个今天正在读书的人：读书所学，究竟何事？

像文天祥那样读书，与先贤对话，养一身浩然正气

从公元1276年正月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使元营，到公元1283年在刑场从容就义，除去中间短暂逃离，文天祥被羁押长达7年。其间，他被关押在今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的一间土屋近4年，他在《正气歌》的自序里描写了这间土屋，“余囚北庭，坐一土室。室广八尺，深可四寻。单扉低小，白间短窄，污下而幽暗。”这深暗的地下室，包含着七种气：水气、土气、日气、火气、米气、人气、秽气，而文天祥心里盘桓的，只有正气，就是孟子所说的“浩然之气”。全凭这一口气，他写下了《正气歌》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予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……”

《正气歌》是一场跨越1600多年的对话，对话的那头是孟子，对话的核心话题就是“浩然之气”。孟子是“浩然之气”的原创者，他在谈论个人修养时提到了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孟子倡导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而“浩然之气”正是通过“由仁义行”这种方法所养成的精神境界，它是人的内心自觉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。这些思想，文天祥用《正气歌》进行阐释，用行动来体现。

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忠臣烈士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”。正直如何培养，不就是义所当为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该如何便如何，将生死置之度外吗？

文天祥最后一次和忽必烈的对话，他先是感谢了忽必烈对他人品才华的赏识。但是面对忽必烈让他投降之后可以继续做宰相的条件毫不心动，坚定表示“一死之外，无可为者”（《文天祥全集》卷一九《附录一》），要求忽必烈成全他。《正气歌》中的“于予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”，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这股“浩然正气”，而孟子在书里说明了这股气该如何培养，要配以义和道，才能让这股气充满天地间。

文天祥和忽必烈的对话，展现了一位读书人对信仰的忠诚，这种宁死不屈、坚贞不渝的忠诚，连他的对手、他的敌人都感到震撼、感到敬佩、感到绝望，这就是“沛乎塞苍冥”的浩然之气强大的力量。

在《正气歌》里我们也找到了文天祥读书求道的路径和方法，那就是向先贤讨教，向经典讨教。特别是在面对一个突变的时代，也是最需要向古代传统中寻找智慧和力量的时候。而文天祥身上更为难得的是，他并没有停留在寻找的过程，而在一路寻找一路实践，用古人的智慧指导自己的行动。

长久以来，《正气歌》被认为是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理解和阐释都十分深刻、精准的文章，也是文天祥在苦难中悟出来的真理，在古代传统中寻找到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之充沛和强大足以证明，从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立命根基，从古代先贤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精神源泉，是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随时开始的事情。

像文天祥那样读书，被故土滋养，铸一副铮铮铁骨

一个人的学问可以向传统汲取养分，但是品格的养成或许更多地要回归到他的成长环境。公元1236年6月6日，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。吉州扼湖南、江西两地咽喉通道，上可溯赣江挽闽广，下可至鄱阳湖畅达长江下游各地，经济与文化都非常发达，素有“江西望都”之称，也被誉为“文章节义之邦”，地方官学、书院和乡塾村校齐立，读书求仕风气盛行，文天祥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。

公元1241年，6岁的文天祥开始入塾读书，由父亲文仪亲自授课，书斋名曰“竹居”，希望文天祥能像竹子那样宁折不弯、顽强正直、有节操。从此，文天祥以竹为榜样，不断磨砺自己的性格。父亲文仪在当地被称为“有德君子”，远近闻名，这也影响着文天祥，滋养着他的性情。

公元1253年，年满18岁的文天祥参加了在庐陵县城举行的县学考试，以《中道狂狷，乡原如何》一文，一举夺得头名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，文天祥往游吉州乡校。当他到学官乡贤祠，瞻仰供奉在那里的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等人的画像时，顿觉热血沸腾，大声喊出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豪言壮语：“发不组豆其间，非夫也！”（《宋史》卷四一八《文天祥传》）

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是何许人也？儿时爱读忠臣传的文天祥对这些乡贤是再熟悉不过了，他们都是庐陵的骄傲，都有一身铮铮铁骨。

除了前面说到的三位乡贤，还有两个名字中含“万里”的人也在文天祥成长道路上影响甚深，一个是立朝刚正、遇事敢言，一生反对议和的著名诗人杨万里，另一位就是与白鹭洲书院结下一辈子深厚情谊的江万里。后者不但改变了作为学生的文天祥的人生，也影响了作为朝臣的文天祥的命运。

文天祥后来每每在忠诚见谅、仕途受阻、心情郁闷的时候，他都会求教于这位恩师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这位精神导师最后以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完成了自己对文天祥的最后一次“授课”：公元1275年，元军攻破饶州，一代忠臣宰相江万里面对敌军，以78岁衰老之躯，毅然以死明志，养子江镐携妻抱子随父赴难，全家老老少少几十口人一同投水而死。文天祥闻讯，以诗文泪祭恩师：“星折衡地，斯文去矣休。湖光与天远，原注沧江流。”（《文山先生文集》卷十六）

风物化人，水土养人。这个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给文天祥的成长提供了足够多的养分。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读书求学生涯，几乎会影响他日后性格的养成。文天祥有一个好的启蒙老师，而后出外求学遇到的老师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，都是当时的佼佼者，这让他的人身得到了很好的滋养。在中状元之前，文天祥在这块土地上读书求学，而最终这些养分也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。

当他在仕宦生涯或抗元斗争中屡遭挫折时，应该会想起故乡的这些山山水水吧，那被绿水环绕的白鹭洲，清秀雅静的青原山，还有给予他力量的乡贤、良师们。“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”，那些在心中无数次涌起的柔情和思念，都化作了他的铮铮铁骨和绝不屈服的意志。

文天祥的少年时期，正是南宋王朝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机时期。南宋的时局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？南宋历代帝王包括孝宗赵昚、光宗赵惇、宁宗赵扩、理宗赵昀等虽“不懈努力”，但最终都未能阻止国家走向衰亡。到了南宋末年，剥削苛重、百姓困苦、经济衰退、政治腐败、军力不足、土风萎靡、国力衰弱，而与此同时，蒙元灭金、灭西夏，势如破竹。

公元1256年，五月初八，文天祥参加殿试，以一篇洋洋万言的《御试策》被点为状元，文章展示了文天祥对时局的判断，以及对于改变积弊已久的现状的迫切心情。这是他的爱国热情和对民族兴衰的责任感第一次集大成体现。三年之后，1259年，文天祥看到继续恶化的时局，再也忍不住，向理宗冒死直谏，万言书《已未上皇帝书》里有他那些年的沉淀和思考，有对时局更深刻的了解和更为可行的政治、军事改革主张。一颗忠义爱国之心跃然纸上。

文天祥物理生命的长度是47年，人生的前20年是相对平静而和煦的，后27年犹如风刀霜剑的寒冬，全是磨励和锤炼：万言上书直抒己见遭冷遇，奔赴各地担任各种职务被奸臣陷害，遭遇撤职赋闲在家，再被启用赴各地做官，最后起兵勤王被俘就义。而文天祥正是在这样的遭遇中，继续求知，不断成长，他的一腔家国情怀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局中变得更坚定成熟，更炽热滚烫。

公元1275年正月，经历宦海几度沉浮的文天祥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书，命他“疾速起发勤王义士，前赴行在”。他捧读诏书，泪流满面。文天祥一向以身许国，如今国运垂危，岂能坐视！没有人，他振臂一呼各方响应，义军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；没有粮草，他变卖所有家产以充当义军军费。

回望文天祥人生的大部分时间，他所面对的，一边是腐朽的宋廷，一边是残暴的元兵。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，文天祥提倡改革受到阻挠，起兵抗元得不到朝廷支持。但是他仍然竭尽全力，无比坚定地做着应该做的事情：揭露朝廷弊政，斥责谰国奸佞，反抗敌人侵略，赞美壮丽河山，重视历史文化，崇拜仁人志士，思念故乡亲友，孝敬父母师长，同情贫苦人民……这些饱满丰富的情感在他的《指南录》《指南后录》《吟啸集》和《集杜诗》等著作中表露无遗。

在突变的时代里时刻保持敏感而勤于思考，这些读书求学的方法最终形成了文天祥思想，并体现在他的著作中。

最终，他还是用放在衣带里的那封遗书，为自己一生读书求道生涯作了一个最为深刻的总结：
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

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！

文天祥最后用言和行回答了那个终极命题，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”成仁取义，义尽仁至，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又是何呢？不外乎就是为那一身浩然正气，那一副铮铮铁骨，那一腔家国情怀；不外乎爱国爱民、坚守道义，为了正义事业可以牺牲所有。

当这个问题穿越700多年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作答呢？

我们不妨问问：当下的我们，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在读书的时候，还会有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纯粹追求吗？当AI越来越多地介入我们读书求知的过程，知识、文化好像唾手可得，求“道”也仿佛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和神圣，那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读书方法来修炼自己内心呢？

我至少相信：当我们面对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时，仍然需要一些超越自身利益的东西来守护内心的平静，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和我们当下的结合，叫“浩然之气”也好，叫仁义道义、家国情怀也罢，最终都将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。唯有相信这些，我们今天的读书才有意义，才能真正坚持下去并贯穿一生。

像文天祥那样读书，将古老的智慧和坚韧，转化成当下生存的力量。就这么坚持下去，到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个问题了：

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”

上下求索，永不停息！”